

三十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几个问题

손제* · 노정은**

【目 录】

1. 引言
2.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状况
3.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立场
 - 1) 启蒙：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 2) 革命：弱小民族文学与左翼文学
4.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路径
5.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误读
 - 1) 误读的前提：意识形态、诗学观与赞助人
 - 2) 以胡风《山灵》为例
6. 结语

【摘要】

3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启蒙”与“救亡”的两大时代主题下，在对传统文学做出改良的同时，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不仅有西方先进国家的文学作品，还有为数不多的韩国文学作品。大部分的学术文章在讨论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活动时，重点都放在了中国的立场之上，即以译文(target oriented)为中心。但是，韩国文学作品的中译路径复杂，存在着直译与转译两种形式，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译者的诗学观、出版社也都对韩国文学的中译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仅从中国的翻译立场出发去讨论问题，难免会造成认识上的狭隘。因此，本文重新整理相关资料，在总结中国译者翻译立场的基础上，兼顾原作文本的定位，尝试分析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译活动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译；30年代；韩国文学；重译；山灵。

* 건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중한비교어문학전공 박사 수료 (sunjikor@naver.com)

** 교신저자, 건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중국현대문학전공 교수 (rjecilvia@hanmail.net)

1. 引言

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中国文学也经历着从“旧”到“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自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刊载《狂人日记》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浪潮可谓是投袂而起。在“启蒙”与“救亡”¹⁾两股激流的涌动下,文学革命早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到了30年代,文人的理想与激情空前强烈,几乎充斥着整个中国文坛。

就在中国文学革命如火如荼之际,作为启蒙者的文人认识到如果要改良中国文学,彻底冲破“旧”文化的枷锁,西学东渐则是必经之路。因此,代表“新”的西方文化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海外名篇译作也接踵而至。其中,190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出版的首部译作《域外小说集》,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译的先河之作,就如其序文中所写道:“异域文新宗,自此始入华土。”²⁾在后来的现代文学三十年间,中国文坛的译作成果颇为丰富。

然而,当时被译介到中国的作品不仅只有被视作“先进”的西学,与中国东北接壤,向来羸弱的朝鲜,也不乏有多部小说被译介到中国。这一点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中韩两国学界所忽视,当然这与过往中韩两国所处的政治外交环境不无关系。在中国学界,王瑶教授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真实的镜子——从几篇新文学作品看中朝人民的友谊〉一文,首次谈到“这类的(韩国文学中译)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仍然是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³⁾文中以胡风所译的《山灵》为例进行了简要分析。

从翻译角度来看,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邹振环(1995)的〈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⁴⁾一文,文中依次简略地介绍了《朝鲜传说》、《朝鲜民间故事》、《朝鲜童话》、《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朝鲜现代童话集》、《朝鲜短篇小说选》等8部编译作品,以及范泉所译张赫宙的《朝鲜春》和《黑白记》2篇。另外,金鹤哲(2008)在〈1949年以前韩国现代文学中译和意识形态因素〉⁵⁾一文中更为广泛地介绍了29篇译作,并提出影响选择译作文本的三种意识形态,即“弱小民族”、“抗日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

在翻译专著中,杨昭全(2004)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⁶⁾第三部分“现代篇(1919~1945)”的〈中朝人士关于朝鲜之著述〉一章的〈翻译朝鲜文学作品〉中再次谈到邹振环已列出过的8部译作。另外,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系列丛书的《现当代部分第二卷》的第12章〈北朝鲜和韩国文学〉中,重点叙述了50年代以后(当代)的韩国文学翻译状况,而关于现代部分仅有“30-40年代我国翻译的朝鲜文学多属民间故事、童话之类,如1930年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清野编的《朝鲜传说》,1932年上海女子书店出版的刘小蕙翻译的《朝鲜民间故事》,以及其他《朝鲜现代儿童故事

1) 有关“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与“救亡”观点的论述,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2)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168。

3) 王瑶,〈真实的镜子——从几篇新文学作品看中朝人民的友谊〉,《光明日报》,1951。

4) 邹振环,〈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韩国研究论丛》,1995,pp.197-213。

5) 金鹤哲,〈1949年以前韩国现代文学中译和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2009。

6)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集》(邵霖生编译)、《朝鲜童话》(吴藻溪编译)、《朝鲜民间故事》(丰一吟等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等。”⁷⁾寥寥数百余字的概述。再有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以及《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都在有关亚洲诸国文学翻译的章节中谈到了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现象,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的简介而已。

再将目光转向韩国学界,关于这一问题,一方面,申正浩(신정호)(2003)最早通过〈‘朝鲜作家’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坛的视角〉(‘조선 작가’ 소설과 중국 현대문단의 시각)⁸⁾一文归纳出韩国文学中译的两种不同来源,涉及译著20余篇。另一方面,金宰旭(2009)的〈文献资料: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根据——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韩国著译的文献问题〉⁹⁾则从宏观上对相关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收集和整理,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依据。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中国学界还是韩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主流认知都是停留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立场之上的,仅从译者的视角来理解韩国文学的中译活动。这样阐述所带来的结果并没有错误,但却忽视了韩国文坛对译文原作的界定,对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作品的分析上难免存在着局限性。因此,本文在先前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探讨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立场的形成历史,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兼顾译文与原作,尝试分析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译活动存在的问题。

2.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状况

1925年《语丝》第28期刊载了周作人所译的“朝鲜传说”¹⁰⁾小说三篇,从此掀起了中译韩国文学的序幕。进入30年代后,更多的韩国文学中译作品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内。从大致的轮廓上来看,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作品中,单篇译作有13篇,单行本有6部,其中深吟枯脑译金永八(김영팔)所著的《黑手》(검은 손)一文,既是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作品的开篇之作,也是韩国现代小说的最早中文译本。有关30年代韩国小说中译的具体状况,本文查阅相关资料,所作整理如下:

第一,单篇:

年度	原著	译著	作者	译者	出版
1930	검은 손	黑手	金永八(김영팔)	深吟枯脑	《现代小说》第3卷第4期
1930	용광로	熔矿炉	宋影(송영)	白斌	《现代小说》第3卷第5—6期
1933	쫓기는 사람들 (追はれる人々)	被驱逐的人们	张赫宙(장혁주)	王笛	《文学杂志》第3、4号合刊

7)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8) 申正浩(신정호),〈‘조선 작가’ 소설과 중국 현대문단의 시각〉,《중국소설논총》,2003, pp. 489-511。

9) 金宰旭,〈文献资料:学术研究的基础和根据——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关韩国著译的文献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10) 周作人从日本三轮环编辑的《传统之朝鲜》中选译了《崔致远》(최지원)《斗法》(두법)《掉文》(도문)3篇朝鲜民间传说,题名“朝鲜传说”,发表在1925年5月25日《语丝》第28期。

1934	구직(求職)과 고양이	猫	赵碧岩(조벽암)	李剑青	《矛盾》第3卷第3—4期合刊
1934	쫓기는 사람들 (追はれる人々)	被驱逐的人们	张赫宙(장혁주)	叶君健	《中华月报》第3卷第6号
1934	權 이라는 사나이 (權といふ男)	姓权的那个家伙	张赫宙(장혁주)	黄源	《文学》第3卷第1号
1936	질소비료공장	初阵	李北鸣(이북명)	胡风	《译文》新第1卷第1期
1936	전투	战斗	朴怀月(박회월)	翠生	《世界文学读本》： 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社
1930	병감(病監)에서 죽은 녀석	狱里病死的家伙	林和(임화)	白斌	《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 “新兴文学专号(下册)”
1930	이 꼴이 되다니	咳，成这样子了	权焕(권환)	白斌	《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 “新兴文学专号(下册)”
1932	동해에서	在东海上	郑荣水(정영수)	常任侠	《收获期》：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33	까마귀	乌鸦	全用(전용)	穆木天	《申报·自由谈》： 〈朝鲜童谣二首〉
1933	목사님과 제비	牧师和燕子	朴牙枝(박아지)	穆木天	《申报·自由谈》： 〈朝鲜童谣二首〉

第二，单行本：

年度	原著	译著	作者	译者	出版
1930	朝鲜传说 ¹¹⁾			清野	上海儿童书局
1932	朝鲜民间故事 ¹²⁾		H. Garine	刘小蕙	上海女子书店
1934	朝鲜童话 ¹³⁾			吴藻溪	北平世界科学社
1936	朝鲜现代童话故事集 ⁴⁾			邵霖生	南京正中书局
1936	朝鲜现代童话集 ¹⁵⁾			邵霖生	上海中华书局
1936	山灵——朝鲜台湾 短篇小说集 ¹⁶⁾			胡风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1) 《朝鲜传说》，由清野编译，上海儿童书局1930年6月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人物篇”（《檀君》、《三个仙人》、《朴尼》、《金蛙》、《孤儿》、《人卵》、《飞仙花树》、《鬼桥》、《龙女的儿子》、《高丽寺》、《后母》、《测字》、《金应瑞》、《弥勒》、《金刚铜》、《七佛寺》、《竞仙术》）、“山川篇”（《清流壁》、《大圣山》、《白鹭里》、《雷山》、《义狗冢》、《崇儿山》、《龙井》）、“动物篇”（《狸》、《虎》、《猫》、《狐》、《狐媚》、《金色猪》、《雨蛙》、《乌贼》、《车氏的先祖》、《鸟》）、“植物篇”（《消痰烟》、《葛和藤》）4部分，共译朝鲜传说36篇，书前有清野所作〈告小读者〉序文，在书后〈附录〉中又译有《两兄弟》、《愚兄贤弟》、《婆媳》3篇童话。

12) 《朝鲜民间故事》，由刘小蕙所译，上海女子书店1932年6月出版发行。原作是H. Garine侨居朝鲜时搜集并用中俄文对照出版的，后来Serge Persky又根据俄语译为法语。本书转译自法语译本，刘半农校改，周作人、章衣萍作序，蔡元培题签，徐悲鸿作绣像插图。收录《八去福》、《卜者》、《沉清》、《孔夫子》、《画家》、《李无忧》、《高与古氏》、《莲池》、《车福》、《蜈蚣精》、《叔父》、《梁与石氏》、《猫》、《梅氏》、《一个不忠实的朋友》、《鸟语》、《孤儿》、《两块石》、《奴的妻》、《誓约》等朝鲜民间故事20篇。

13) 《朝鲜童话》，由吴藻溪编译，北平世界科学社1934年2月出版发行。书前有吴藻溪所作〈给小姊妹们〉序文，收录《年龄之比较》、《争马》、《传书鸠》、《成双成对的鸭子》、《红豆物语》、《胡桃之

3.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立场

“启蒙”与“革命”的时代氛围塑造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思潮，即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在探索文学的道路上，作家无法回避社会的现实，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功利性。而翻译活动也是如此，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在主流意识的操纵下，不自觉地将自身的立场带入到译作之中。因此，本文将以“启蒙”与“革命”为背景，来讨论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时所涉及到翻译立场。

1) 启蒙：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1) 儿童文学

翻译儿童文学是30年代翻译外国文学时的重要立场之一，在以“启蒙”为时代命题的新文化运动下，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最后写道“救救孩子”一样¹⁷⁾，儿童文学的翻译贯穿于五四时期备受瞩目。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学刊物，和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都曾致力于儿童文学的翻译活动。

然而，如果讨论创作儿童文学的主张，早在晚清时期便已拉开了序幕。康有为在《论幼学》一文中提到：“经学以虚名相传，人道之宜，则未有留意者，于是，二千年来，竟无一书为养蒙计者。”¹⁸⁾后来梁启超承续这一脉络，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进；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的趣味不可。”¹⁹⁾正是

音》、《天女的羽衣》、《爱说中国话的汉子》、《中国皇帝的使节》、《占卦的先生》、《骡子之耳》、《一误再误》、《金锥》、《运气不好》、《痴婿》、《远处的火灾》、《大樱桃》、《折足的燕子》、《爱吃饼的男子虎与喇叭》、《人与虎之斗争》、《瞎子的宴会》、《对不起父亲》、《镜中人》、《男仆》、《兔子的眼珠》、《宝石》等朝鲜童话27篇。

14) 《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由邵霖生编译，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1月出版发行，后来上海正中书局1947年3月再版，题为《朝鲜现代儿童故事》。书前有邵霖生所作〈前记〉，收录《不能清偿的损失》、《礼物》、《母亲的声音》、《旧同学》、《两个樵童》、《少年职工》、《饭盒里的秘密》、《麻雀的训词》等朝鲜现代儿童故事8篇。

15) 《朝鲜现代童话集》，由邵霖生编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11月出版发行。书前有汤治我所作〈汤序〉，邵霖生所作〈自序〉，收录《老虎和柿饼》、《国王的耳朵驴耳朵》、《不会叫的叫虫》、《小石头》、《苹果树》、《岩石的悲哀》、《老秃子》、《堕落了的行脚僧》、《月儿的话》、《碎了的花瓶》、《燕子和博士》、《虎的报恩》、《小狗》、《黄牛》、《乌鸦》、《虎》、《七只乌鸦》、《戴了假面具的老虎》、《玉色的葫芦瓶》、《两个哥哥的悔改》、《老皮匠的快乐》、《三只公羊》、《两只皮鞋》、《小鸡》、《金鸡》、《牛乳牧场》、《跌死了的姊妹俩》等朝鲜童话27篇。

16) 《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由胡风编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出版发行，属于“译文丛书”系列。书前有胡风所作〈序〉，收录杨逵《送报夫》、吕赫若《牛车》、杨华《薄命》台湾小说3篇，张赫宙《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初阵》、郑遇尚《声》韩国小说4篇。

17)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 455。

18)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汤忠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p. 130。

19)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选集》(下卷)，易鑫鼎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因为有了传统上蒙学精神的沉淀，才会出现五四时期倡导儿童文学的思潮。

五四时期，“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²⁰⁾的启蒙新思想将青少年推上了时代的浪尖。陈独秀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由此掀起了儿童启蒙的热潮。在当时主张以翻译外国儿童文学来启蒙中国儿童的作家之中，首屈一指的便是周作人。周作人1920年在《新青年》发表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檄文”的《儿童的文学》一文，指出“儿童同成人一样的需要文艺”，新文学有“供给他们文艺作品的义务”，他恳切地呼吁知识界的志士仁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儿童文学，并构想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²¹⁾

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周作人早已经将这种理念付诸到实践之中。早在1909年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时，周作人便首当其冲翻译了淮尔特(Oscar Wilde)的童话《安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后来又在1913年12月《桑社丛刊》的创刊号“史传”专栏上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²²⁾一文，经由鲁迅的推介，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安兑尔然(H. C. Andersen)的《卖火柴的女儿》(The Little Match Girl)，接下来又翻译了《皇帝之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被收在群益书局1920年重印的《域外小说集》中。

周作人的这一翻译主张，很快便得到了文学界的广范响应，包括其兄鲁迅²³⁾在内，胡适、茅盾、郑振铎等现代文学主将们纷纷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一时之间，正如其所构想的“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一般，各种儿童文学翻译活动蜂拥而至。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其阵地期刊《小说月报》自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便开设了“儿童文学”专栏，另一重要刊物《文学旬刊》也刊载了大量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此外还推出了“文学研究会”翻译儿童文学系列丛书。而与其同期的另一个重要社团——创造社，也同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儿童文学的翻译活动。两个社团的主张上虽然存在着分歧，但在倡导翻译儿童文学这一方面却出奇的保持一致，也正因如此，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在1920年代达到了顶峰。

30年代初，随着文学社团的解散，翻译儿童文学所依赖的阵地虽然不复存在，但在各大出版社的推动下，其繁荣景象丝毫没有减少。这一时期发行的儿童文学翻译丛书主要有：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中华书局的“儿童文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上海中华书局的“世界童话丛书”等等。而此时期的韩国儿童文学作品，也在这一主张下得以翻译发表。例如，由吴藻溪编译北平世界科学社出版的《朝鲜童话》，由邵霖生编译南京中正书局出版的《朝鲜现代儿童故事集》，收录于上海中华书局“世界童话丛书”由邵霖生编译的《朝鲜现代童话集》等。

p. 1070。

20) 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p. 72。

21) 方丽娟，《被发现的儿童：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拓荒史》，台北：秀威资讯，2015，p. 108。

22)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的安兑尔然是当时周作人翻译安徒生所用的译名，文中写道：“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介绍其行业如此。”这是当时发现的有关安徒生童话的第一篇论述，文章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创作。参见：张道振，〈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安阳工学院学报》，第3期，2006。

23) 鲁迅也是《小说月报》最早的儿童文学翻译实践者，他在1922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上曾发表俄国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世界的水灾》。

(2) 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作为学术术语最早出现在梅光迪写给胡适的信中，他在1916年3月19日的信中写道：“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 (Folklore, Popularpoetry, Spoken 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讪笑攻击耳。”²⁴⁾可见，梅光迪所认为的民间文学应包括民间传说(Folklore)、大众诗歌(Popularpoetry)、口头语言(Spoken language)等内容。其实，在晚清时期已形成一种关注民间的思潮，如梁启超所认为的“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也”²⁵⁾当时对民间歌谣、戏剧、神话、传说、寓言等多方面都有所涉猎。而真正意义上标志中国民俗学的产生，则要等到1918年2月1日刘半农所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一文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发表。

毋庸置疑，周氏兄弟也是民间文学的初期构建者。鲁迅早在《破恶声论》²⁶⁾中便论述了神话与整个文学史的关系，“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同时，表明他对于神话的立场：“……复次乃有借口科学，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者，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夫龙之为物，本吾民神思所创造，例以为动物学，则既自白其愚矣，而华土同人，贩此又何为者？抑国民有是，非特无足愧怍已也，神思美富，益可自扬。”²⁷⁾

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明确地提出“初民”与“诗人”两个相互对照的概念。在他看来，“后世文人整理神话，使得此一反映初民信仰的艺术得以保存，但文人用以‘歌颂记叙’之时的‘粉饰’则改易了神话，使失其本来，继而消歇。”²⁸⁾鲁迅对民间文学所持的态度，是否得益于其恩师章太炎²⁹⁾，自然不能够轻易断言。但从他耗时13年，在生命最后尽头所完成的《故事新编》³⁰⁾来看，他在思想上经历过初期的革命热情之后，晚年流露出的是关于民间文学的深深反思。

另外，1919年1月周作人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主张以民俗学为基础构筑民间文学的理论，进行神话、童话、歌谣等多方面的学术与文艺的研究。胡适接受并发展了周作人的这一思想，他在《白话文学史》中清晰地阐述了“民间文学”

24) 罗岗·陈春燕，《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p. 162。

25) 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1903。

26) 〈破恶声论〉最初发表于1908年12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第8期，署名迅行。参见：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 36。

27)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 32。

2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北京：北大第一院新潮社，1923，p. 19。

29) 有关章太炎、鲁迅的民间文学观点可参考钟敬文先生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等多篇论著。参见：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0) 《故事新编》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收录了鲁迅在1922年到193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八篇。其中《补天》写于1922年冬天，原题《不周山》，收录在《呐喊》初版，后改名《补天》并抽出；《奔月》、《铸剑》写于1926年和1927年，《铸剑》在《莽原》上发表时题名《眉间尺》；《出关》、《理水》、《非攻》、《采薇》、《起死》写于1934年到1935年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

的概念，既兼顾到文学，又要注意到作为文化承载者的“民”。后来他在“双线文学”论中提出平行于古文文学的另一个条线索，即那个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活的民间诗歌、故事、历史故事诗、巷尾街头那些职业讲古说书人所讲的评话等等不一而足。³¹⁾

在这一主张下，周作人在1925年5月25日《语丝》期刊上发表了其所译的《朝鲜传说》一文，试图抛开当时主流的政治框架去重新认识韩国文学。并随刊在译文后附有〈朝鲜传说附识〉一篇，他写道：

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东亚文明的人所不应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以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该知道朝鲜所能给与的未必会少于日本。这几遍虽只是民间传说，又是出于重译，不能说有多大的价值，但在中国人读了当能感到一种特别的，既非日本又不全是中国的趣味。我想在这里便表明对于朝鲜艺术的敬意，希望有人介绍那些优美的雕刻绘画给中国人看。³²⁾

而刘小蕙，承继了其父亲刘半农的民间立场，在1932年由法语转译并发表《朝鲜民间故事》一书，周作人为其作序，感慨道“对于朝鲜是那么的生疏”³³⁾。可见，在30年代“启蒙”的思潮下，翻译民间文学的主张推动了韩国文学中译活动的展开，译者在主观上从民间的立场出发，将韩国文学译介到中国。

2) 革命：弱小民族文学与左翼文学

(1) 弱小民族文学

所谓“弱小民族文学”，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译介外国文学时特有的翻译立场。“弱小民族文学”观念的出现，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息息相关，究其渊源可上溯到晚清思想家梁启超，他在《新民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民族主义的文学观，对后来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影响颇深。“弱小民族”这一观念最早出现在陈独秀(1921)的《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³⁴⁾一文中，文中将印度、波兰等殖民地国家称为弱小民族。据宋炳辉(2002)考证，“弱小民族”所指：“其一，欧洲的弱小民族；其二，除日本以外的其它亚洲国家(印度、韩国、越南、土耳其等国)；其三，偶尔泛指古代经典文学(古代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和印度文学)。”³⁵⁾

那么究竟是何人开启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先河呢，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若说最早有意识地提倡和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代表人物，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周作人和鲁迅。³⁶⁾周作人早在1908年撰

31)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p. 289。

32) 周作人，〈朝鲜传说附识〉，《语丝》，第28期，1925。

33) 周作人，〈《朝鲜民间故事》(序二)〉，《朝鲜民间故事》，上海：上海女子书店，1932。

34) 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新青年》(第9卷)，1921。

35) 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比较文学》，第2期，2002。

36) 陆志国，〈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以五四时期矛盾的翻译选择为例〉，《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1期，2013。

写《哀弦篇》时，视波兰、乌克兰、希伯来为弱小民族，写道：“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暗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士，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³⁷⁾并且在文章的结尾处引用尼采的话，“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吾亦以是为小希焉尔”。周作人有意将弱小民族文学的“移情”付诸到实践中，并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翌年，其兄鲁迅与其共译《域外小说集》，收录译作16篇，其中有13篇可以归入到“弱小民族文学”的范畴，随后在1920年《域外小说集序》中以周作人的署名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³⁸⁾而关于为何选择译介弱小民族文学，鲁迅给出的理由与周作人的初衷不尽相似：

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的调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³⁹⁾

《新青年》杂志同样重视弱小民族文学，1915年创刊以来到1921年，先后刊登了此类译文31篇。而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另一位倡导者——茅盾则继承了周氏兄弟及《新青年》的理念，并延续到《小说月报》之中。在其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弱小民族文学比重明显上升，曾将该刊第12卷10号辟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刊载了12个弱小民族国家及地区的21篇译作，8篇译介文章。关于这些，茅盾在《〈雪人〉自序》中回忆道：“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⁴⁰⁾

以上便是“弱小民族文学”立场下译介活动的初衷与脉络，那么在韩国文学中译过程中，这种立场是如何扩展其外延的呢？首先，我们将时间定格在20世纪初叶。这一时期有关韩国的译介还集中在史学的范畴中，先有梁启超编译《朝鲜亡国史略》及《朝鲜灭亡之原因》两篇，又有《朝鲜史略》、《朝鲜亡国史》、《朝鲜亡国演义》、《韩国痛史》等多部史书。⁴¹⁾1904年《大陆报》刊登作新社⁴²⁾《朝鲜史略》“新书广告”中写道：“东方弱国，朝鲜为最，然其政治风俗腐败，

37) 周作人，〈哀弦篇〉，《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钟叔河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p. 149。

38) 出自《域外小说集》序一文，据序文所注，该篇最初印入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合订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署周作人。后来周作人在《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中对此有所说明：“过了十一个年头，民国九年春天上海群益书社愿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名，也是豫才所写的。”参见：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 176。

39) 鲁迅，〈我怎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 525。

40) 茅盾，《雪人》，上海：开明书店，1928，p. 2。

41) 梁启超，〈朝鲜亡国史略〉，《新民丛报》，第53-54号，1904；梁启超，〈朝鲜灭亡之原因〉，《国风报》，第22期，1910；《朝鲜史略》，上海：作新社，1904；李芝圃编译，《朝鲜亡国史》，保定：直隶教育图书局，1911；广文书局编译所编译，《朝鲜亡国演义》，上海：世界书局，1915。太白狂奴，《韩国痛史》，上海：大同编译局，1915。参见：孙科志·徐凡，〈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韩国史研究〉，《当代韩国》，第4期，2014。

42) 作新社，又称作新图书局、作新译书局、作新书社、作新书局等，1901年在上海由留日学生戴元丞与日本女教育家田歌子合作开办。1902年创办的《大陆报》（The Continent），又称《大陆》，是作新社的一项

与中国放佛相似，帮亟译之以介绍于我国，俾知朝鲜积弱，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我中国宜亟读之，藉为前车之鉴。”⁴³⁾后来1915年上海大同编译局《韩国痛史》序文中又写道：“吾国人读之，恐惧忧伤于吾国之影在是焉，其鉴之而有动于中而早发愤焉，中国犹有望也。否则为第二朝鲜不远也噫。”由此可见，在韩国亡国史的译介中，早已显露出把韩国看作东方弱国的意味，并企图以韩国为“亡国史鉴”，来警醒中国的芸芸大众。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类“史鉴”的铺垫，才会使得30年代“弱小民族文学”立场下译介韩国文学有了发轫的余地。

1934年《矛盾》⁴⁴⁾月刊推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⁴⁵⁾，共收录16个“弱小民族”国家的24篇译作，其中包括李剑青所译，韩国作家赵碧岩(조벽암)的《猫》(구직求職과 고양이)一文。此外，胡风(1936)所编译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书中收录其所译韩国小说4篇，关于翻译的契机胡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道：“朝鲜是我们比邻的兄弟民族，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朝鲜人民陷进了当亡国奴的地位，我们当然关心他们的命运。我在日文刊物上发现了这些作品，读了以后，认为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极其难得的材料，因而译了出来。”⁴⁶⁾在“弱小民族”的立场下，韩国小说的中译活动，延续了周氏兄弟、茅盾所倡导的以“弱小民族”为鉴来警醒国人的诉求，赋予了文学更多的社会功利性，主观地迎合了30年代“救亡”的时代精神。

(2) 左翼文学

1920年代末，随着国共合作的中断，混乱再次降临到这片满目苍夷的土地上。时代的导向也不得不从“启蒙”转向“救亡”，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发展到1928年也投身到“革命文学”中，到1930年左联成立后，左翼文学⁴⁷⁾成为中国文坛主流砥柱之一。

作为世界左翼文学的一部分，在时间上，中国左翼文学的发起晚于俄国的“拉普”、日本的“纳普”，即便是朝鲜半岛上，开始于1925年的“卡普”(KAPF)⁴⁸⁾也要早于中国五年之久。而在

重要出版物，通过在《大陆报》上刊登出版物广告，利用报纸的销售渠道，作新社为自身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宣传和代售图书的机构。参见：邹振环，〈戡元丞及其创办的作新社与《大陆报》〉，《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2。

43) 《大陆报》，第5期，上海：作新社，1904，p. 115。

44) 《矛盾》月刊，1932年4月20日在南京创刊，由国民党官方资助，矛盾出版社编辑发行，潘子农、汪锡鹏、徐苏灵三人共同主编，是具有后期民族主义文学倾向的代表性刊物。参见：唐海宏，〈新发现《矛盾》月刊中洪深、徐迟、李金发的佚作〉，《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2017。

45) 《弱小民族文学专号》，1934年5月25日《矛盾》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共设有四个栏目，分别为小说、理论、戏剧、诗歌，收录译作24篇。参见：唐海宏，前揭。

46) 胡风，《胡风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p. 43。

47) “左联(中国左翼文学作家联盟)”，作为一个文学组织，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1936年解散。但作为文学思潮的左翼文学，在时间上却更为宽泛，涵盖了20年代中期开始的革命文学论争和创作，因此，本文在介绍左翼文学的韩国文学译介时，大致以“左联”时期为准，但也不拘囿于此。

48) 卡普(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tio)的简称，发起于1925年的新倾向派文学，同年8月由“焰群社”与“PASKYULA”两个文学团体并和成立“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조선프롤레타리아 예술가동맹)。1926年1月发行准机关杂志《文艺运动》(문예운동)，不久迫于日帝殖民检阅压力停刊。同年夏，由金斗镕(김두용)、李北满(이북만)等人于日本东京组建卡普东京支部，并创刊同人志《第三战线》(제3전선)。翌年11月15日发行机关杂志《艺术运动》(예술운동)。卡普文学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倾向，其代表作家有金基镇(김기진)、朴英熙(박영희)、李箕永(이기영)、韩雪野(한설)

空间上,左联设有东京分盟,韩国卡普则成立东京支部。中、韩左翼文学作家如胡风、任钧、金斗镕(김두용)⁴⁹⁾、李北满(이북만)⁵⁰⁾等人都曾积极参与过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纳普)的活动,并对彼此国家的文坛情况有所关心。考虑到思想传播的途径,这无疑为中国左翼文学界译介韩国文学作品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众多的韩国文学作品也恰恰是在这一契机下由日语转译至中国。

中国“左翼文艺刊物”⁵¹⁾上发表的韩国小说译介最早见于1930年1月15日《现代小说》⁵²⁾第3卷第4期深吟枯脑译金永八(김영팔)⁵³⁾所著的《黑手》(검은 손)⁵⁴⁾一文,随后3月15日该刊又刊载了白斌⁵⁵⁾译宋影(송영)⁵⁶⁾所著的《熔矿炉》(용광로)⁵⁷⁾一文。其次,黄源⁵⁸⁾译张赫宙(장혁주)所著的《姓权的那个家伙》(權 이라는 사나이)发表于1934年7月1日《文学》⁵⁹⁾第3卷第1号。另

야)、赵明熙(조명희)、崔鹤松(최학송)等。参见:장부일·조남철·이상진,《한국근현대문학사》,서울:한국방송통신대학교,2011,pp.252-270。

49) 金斗镕(김두용, 1903-卒年不详),朝鲜卡普的重要批评家和领导人之一。1927年在东京与李北满等人成立“第三战线社”,出版刊物《第三战线》(제3전선)。同年9月,加入卡普并当选中央委员,先后参与创建卡普东京支部、其机关志《艺术运动》(예술운동),以及无产者社及《无产者》(무산자)等,主张艺术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纳普)关系密切。1948年越北,曾任朝鲜外文出版社局长等职。

50) 李北满(이북만, 1908-卒年不详),1927年在东京与金斗镕等人成立“第三战线社”,出版刊物《第三战线》(제3전선)。同年9月,当选卡普中央委员,先后参与创建卡普东京支部、其机关志《艺术运动》(예술운동),以及无产者社及《无产者》(무산자)等。

51) 本文对“左翼文艺刊物”范畴的定义根据马良春、张大明所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一书,参见:马良、张大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2) 《现代小说》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刊物,1928年1月1日创刊,1930年8月15日出至第6卷第6期后停刊,共发行了17期。“在左联筹备和成立的全过程中,潘汉年始终是主要的领导人、热情的组织者。”叶灵凤出席了“左联”成立大会,是最早一批左联盟员。《现代小说》起初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刊物,从第三期开始增加革命文学内容,1929年10月3卷1期发表潘汉年《文艺通讯——普罗文学题材问题》,号召文艺界有识之士参加“普罗”文学创作,宣布以“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介绍国内和世界的一些战斗的、武器的文艺作品”为方针,该刊逐渐成为革命文学作家的阵地。

53) 金永八(김영팔, 1902-1950),卡普文学团体焰群社创社同人,卡普组织创立会员。但在1930年代初,因就职于京城放送局(JODK)被卡普除名。1924年以题为《미처가는 여자》独幕剧进入文坛,至1930年代初创作了具有左倾色彩的戏剧与小说20余篇。他虽从事卡普文学创作,却不能被视为卡普文学的主力作家,不过是紧随普罗文艺时代潮流的左倾作家而已。

54) 《黑手》(검은 손),原作发表于1927年1月社会主义倾向杂志《朝鲜之光》(조선지광)第63号。这篇小说一度被认为是韩国现代小说最早的汉译本。参见:金鹤哲,〈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汉译和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2009。

55) 白斌生平不详。在介绍林和和权焕的译文后,白斌分别附有小注:“作者现在我国同胞一起坐在日本监狱里”、“作者现在韩国监狱中,是为了本次日人辱韩国女学生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白斌连续翻译了三篇卡普成员的作品,避免了朝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声音被历史湮没。

56) 宋影(송영, 1903-1978),写实主义作家,卡普文学团体焰群社创社同人,1925年7月以短篇小说《不断增加的人群》(늘어가는 무리)参加《开辟》(개벽)征文并获奖,随后加入卡普阵营崭露头角,1929年担任卡普机关杂志《朝鲜文艺》(조선문예)负责人,1946年10月越北。

57) 《熔矿炉》(용광로),原作发表在1926年6月《开辟》第70号。

58) 黄源(1905—2003),俄语和日语翻译家。1931年为上海新生命书店编辑“世界新文艺名著译丛”。1933年进入《文学》杂志社担任编校,1934年8月兼任《译文》杂志及《译文丛书》的编辑。他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在鲁迅亲自引导下,认定了方向”,走上革命道路。

59) 《文学》,由茅盾、郑振铎提议,于1933年7月创刊,主编为郑振铎、傅东华,实际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十人组成编委会集体负责。据黄源分析,

外, 1936年3月16日《译文》⁶⁰⁾月刊新1卷第1期(复刊号)刊载了由胡风译李北鸣(이북명)⁶¹⁾所著的短篇小说《初阵》(질소비료공장)⁶²⁾。诗歌方面, 1930年5月1日《大众文艺》⁶³⁾第2卷第4期“新兴文学专号(下期)”“各国新兴文学”栏目刊载了白斌译林和(임화)⁶⁴⁾所作的《狱里病死的家伙》(병감病監에서 죽은 녀석)⁶⁵⁾及权焕(권환)⁶⁶⁾所作的《咳, 成这样子了!》(이 꼴이 되다니)⁶⁷⁾诗两首。

上述的译作都发表在左翼文艺刊物上, 译者又都是左联盟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作家。可以想到, 这些译作的目的是在介绍同属左翼阵营的韩国卡普文学, 并用来壮大无产阶级文学, 进而实现革命文学的目标。但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也势必限定了其翻译活动的初衷要以左翼文学为基准, 符合左翼文学这一倾向。

即使在1936年左联解散以后, 韩国文学的中译活动依然保持着左翼文学思想的余绪, 如1941年7月长春新时代社出版王赫所编的《朝鲜短篇小说选》一书, 书中收入5位韩国作家的8部短篇小说。其中古辛译李孝石(이효석)著《猪》(돈)、罗懋译李泰俊(이태준)著《乌鸦》(까마귀)、邹毅译金史良(김사량)著《月女》(월녀)、羊朔译俞镇午(유진오)著《福男伊》(복남이)、迟夫译张赫宙(장혁주)著《李致三》(이치삼)、夷夫译张赫宙(장혁주)著《山狗》(산개)都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学倾向。

此外, 当时张赫宙的多部作品中被中国左翼文学界采纳并译成汉语, 其中1933年8月15日《文学杂志》第三、四号合刊发表了王笛译张赫宙所著《被驱逐的人们》(쫓기는 사람들), 而《被驱

《文学》“编委会中鲁迅、茅盾都是左联的领导人, 胡愈之是秘密党员, 郑振铎、叶圣陶和茅盾都是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 是倾向于革命的。……洪深是戏剧界的进步分子。傅东华是中间偏左。”在编辑上, “《文学》是以左翼观点为主流, 容纳一些艺术流派的作品, 作为保护色”。茅盾也认为, 《文学》“不属‘左联’领导”, “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茅盾, 《茅盾全集》, 第34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p. 579。)

60) 《译文》, 1934年的9月由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 前三期鲁迅亲自编辑, 后由黄源接编, 但鲁迅一致关怀备至, 像发表胡风译文的这一期复刊号, 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亲撰的《复刊词》。

61) 李北鸣(이북명, 1908-1988), 原名李淳翼(이순익), 普罗小说家, 被称为“最早的劳动者作家”。光复后到朝鲜, 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朝鲜作家同盟副委员长。

62) 《初阵》(질소비료공장), 原名《窒素肥料工厂》(질소비료공장), 最初于1932年在《《朝鲜日报》》(조선일보)上连载, 后被日本当局禁止。1935年, 小说被译成日文, 以《初阵》为题发表于日本左翼杂志《文学评论》上。胡风应该是根据日文《初阵》译至中文。

63) 《大众文艺》, 1928年9月20日创刊出版, 前6期由郁达夫与夏莱蒂主编。1930年开始, 由后期创造社成员陶晶孙、龚冰庐接手负责编辑。四位主编中, 除夏莱蒂, 剩余三人皆是“左联”盟员。该刊以“文艺是大众的, 文艺是为大众的”为宗旨, 是左联机关刊物之一, 1930年6月1日被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左联外围刊物”罪名查禁。

64) 林和(임화, 1908-1953), 原名林仁植(임인식), 左翼诗人。1928年经朴英熙(박영희)介绍加入卡普, 1930年在东京参加无产者社的活动。他主张卡普的布尔什维克化, 1932年当选卡普书记局局长, 成为卡普第二世代的主导力量。后在1947年越北, 1953年8月受“南劳党事件”牵连, 被判处死刑。

65) 《狱里病死的家伙》(병감病監에서 죽은 녀석), 原作发表在1929年无产者社出版发行的期刊《无产者》(무산자)第3卷7月号第2号。

66) 权焕(권환, 1903-1954), 原名权景完(권경완), 左翼诗人。1929年5月在东京加入卡普并参加无产者社的活动, 翌年7月当选卡普中央执行委员。他主张卡普的布尔什维克化, 并于1931年领导了卡普的第二方向转换。权焕没有选择越北, 而是留在了韩国, 1954年病逝。

67) 《咳, 成这样子了!》(이 꼴이 되다니), 原作发表在1929年无产者社出版发行的期刊《无产者》(무산자)第3卷第3卷7月号第2号。

逐的人们》还有一个译本，是叶君健据高木宏世界语本转译，发表在1934年6月15日《中华月报》第3卷第6号。后来，叶君健又化名马耳，将这篇小说改名为《流荡》，经上海文艺新潮社1941年4月再版。后文中，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言。

4.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路径

如上文所述，在“启蒙”与“革命”主导下的3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立场，同样作用于韩国文学的中译过程。而作为符合主流思潮的翻译立场也势必会带动韩国文学中译活动的展开。然而，喧哗过后再次来看，以译文为中心(target oriented)的翻译立场，是否会对原作所要传达的情绪造成误读呢？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本文将从翻译的路径入手，进而重新分析30年代韩国文学的中译活动。

语言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基础，在翻译过程中，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与译出语(source language)相互消解最终到达平衡。简而言之，翻译就是“作者——原作——译者——译著”的过程，而“原作——译者”这一环节决定了译作能否完整地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情绪，在考虑译者立场的同时，作为译者获取和理解原作的翻译路径，是讨论30年代中译韩国文学时，不可回避的命题。

30年代中译韩国文学的路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即“直译”与“重译”。所谓“直译”，或称直接翻译，也就是“译语文本直接产生于原语文本，而不以另一种语言的译本作为中介的翻译过程”。⁶⁸⁾这类直译韩国文学作品包括，金永八(김영팔)的《黑手》(검은 손)、宋影(송영)的《熔矿炉》(용광로)、赵碧岩(조벽암)的《猫》(구직求職과 고양이)、朴怀月(박회월)的《战斗》(전투)等。

而所谓的“重译”(retranslation)，又被称作“转译”(indirect translation)，虽然在英语中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但在汉语概念上的界线却十分含糊。本文在讨论时所引用的“重译”的范畴为后者——“转译”。⁶⁹⁾所以，在本文所提到的“重译”(转译)，或称间接翻译，顾名思义就是“文本不直接从原文本翻译而来，而是以另一种语言的译本作为中介的翻译过程”。⁷⁰⁾其包括，张赫宙(장혁주)的《被驱逐的人们》(쫓기는 사람들)、《姓权的那个家伙》(權 이라는 사나이)、《上坟去的男子》(성묘 가는 사나이)、李北鸣(이북명)的《初阵》(질소비료공장)、郑遇尚(정우상)的《声》(소리)等。这些译作重译时大多源自日语文本，但也有例外，如刘小惠所译的《朝鲜民间故事》，则是根据法语译本重译。当然，这与译者自身所掌握的外语能力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译者在选取译作时，所持有的立场以及能够参照的评论体系。

上述由日语文本重译的韩国文学作品中又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即该译作的原作是否有韩语文本的问题。如张赫宙(장혁주)所著的《被驱逐的人们》(追はれる人々)、《上坟去的男子》(墓参に行く男)都是用日语写作发行的，没有韩语文本。而他的另一部作品《姓权的那个家伙》(權 이

68) Shuttleworth Mark,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p. 40.

69) Mona Baker,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p. 233.

70) Shuttleworth Mark, Moira Cowie, 前揭, p. 76.

라는 사나이)便有韩语文本。此外,李北鸣(이북명)的《初阵》(질소비료공장)则更为复杂一些,《初阵》原名《窒素肥料工厂》(질소비료공장),最初在1932年5月29日至31日《朝鲜日报》(조선일보)上连载过2期,后被日本当局查禁。1935年,小说被译成日语,以《初阵》(初陣)为题发表在日本左翼杂志《文学评论》(文學評論)上,但内容上相比1932年的初稿则有较大的改动。⁷¹⁾

韩国小说文本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实际上受到了韩国时局的影响。1910年8月22日韩国被迫与日本签订《韩日合并条约》(한일병합조약),至1945年8月15日光复为止,韩国沦陷为日本殖民地,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日帝强占期”(일제강점기)。1919年“三一运动”(삼일운동)后日本政府感受到殖民韩国的危机,为应对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相的文化殖民政策。韩国文学活动也因此变得掣襟肘见,不仅语言上需要以日语创作,内容上更要接受严格的审查,进而也迫使一些韩国文人东渡到日本,在言论相对自由的日本本土进行文学活动。于是出现了上文所述的只有日语文本,或兼有两种文本的文学作品。

正是这一契机,让一些在日本活动的中国文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韩国文学。但也因此,在韩国文学的中译过程中,译者的立场以及译者所接触到的文学评论体系在他翻译文学作品时,对原作的解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单就“重译”这一过程而言,如鲁迅在〈致曹靖华〉书信中所写道“近因校《铁流》,看看德译本,知道删去不少,从别国文重译,是很不可靠的”。⁷²⁾某种意义上,“重译”作为译者的一时权宜之计,有其自身的不稳定性。而译者立场的文学认知又恰好决定了这种不稳定因素所能波及到解读原作文本时的误区。

不能否认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活动在直译过程已经受到以译文为中心立场的影响,不过重译下的韩国文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同直译一样受到了译者主观立场的影响,对译文的理解上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动摇,出现了有别于原作的情绪。另一方面,重译时译出语因其所具有的别于原作的文化取向,而译者的立场又无法避免受到这种译出语境文化的影响,势必会在译文中出现别于原作的译出语文化认知。

5. 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的误读

1) 误读的前提: 意识形态、诗学观与赞助人

“文学翻译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两种不同文化的遇合际会,必然经历碰撞、协商、消化、妥协、接受等过程。”⁷³⁾翻译学上把解决这种文化矛盾的方式归纳为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⁷⁴⁾,前者主张译文以译出语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71) 李北鸣《初阵》(질소비료공장)后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系朝鲜语言专业重译,题为《氮肥工厂》,收《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修订后选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丛书40朝鲜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胡风《山灵》中收录的《初阵》则是根据日语版本译出。

72) 鲁迅,〈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p.278。

73)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p.3。

74) 有关异化(alienation, or foreignization)与归化(adaptation or domestication)的具体讨论,参见: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e culture oriented, or SL culture-oriented), 后者则主张以译入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oriented, or TL culture-oriented)。而上文中所论述的译者的立场也就是归化的一种表现。归化实质是翻译中所涉及的一种文化转化,“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者,译者也有他的隐含的读者,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的价值,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他在翻译的选择和选择过程中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⁷⁵⁾

影响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活动产生归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译者的翻译立场,而这一时期译者的立场又受到当时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即所谓的“为人生”的立场。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启蒙思潮洗礼下的中国文坛,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念,这一主张不仅作用于本土文学创作,在翻译外国文学时也有着毋庸置疑的地位。强调“为人生”,翻译的实践则要更贴近当前的社会与生活,所以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被认作具有“启蒙”和“革命”性,从而译介到中国。这样的翻译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国民性的改造,但从另一面来看,过分强调“为人生”的社会功利性也使得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强加到译文文本上,在翻译时过多的浸入译者的立场,主观上的倾向使得译者不能客观的把握原文文本,难以避免误读的产生。

所谓误读,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限制,或多或少片面地甚至错误地理解原作。在语言文化翻译程中,译者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原作的读者,译者需要使用译出语去理解原作。但是,在理解原作时,同样作为读者的译者,会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对原作做出反应。而译者的反应很难与原作者所要表达初衷达成分毫不差的契合。另一方面,译者又与一般读者不同,译者在阅读完原作后,还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参照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体系进行翻译,进而向译文的读者传递原作的信息。这样一来,即便是翻译语言的准确性没有问题,但在情绪层次上,受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影响,也会对原作的文学性产生不同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误读可能导致误译,但造成误译的更主要原因是译者自身语言能力的欠缺。误读更多是译者受到主流文化的需求或主观经验的支配,对异文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造,使其能够更容易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30年代韩国文学中译过程中误读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由于译者自身诗学观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浸染,不经意地影响到原作的挑选和译文字里行间情绪的表达。而另一方面,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以出版社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为迎合时代的氛围,也更倾向刊印发行能够满足当时社会和读者需求的译作。

如上所述,30年代中译韩国文学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30年代翻译上所主张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是由鲁迅在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拿来主义〉⁷⁶⁾一文中所提出的,目的是强调当时国人在面对文化遗产和一切外来文化时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韩国文学的译介活动当然属于这个范畴,而所谓的“拿”,也就是“占有”和“挑选”的取舍过程,译者则会凭借自身的立场来左右这一取舍的过程,进而到达其所预期的翻译效果。

在翻译学上,“拿来主义”可以看作是对操纵学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⁷⁷⁾主张的再

出版社, 2004。

75) 谢天振, 查明建, 前揭, p. 3。

76) 〈拿来主义〉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 署名霍冲, 后收录于《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

77) 英国翻译理论家Hermans (1985) 最早把“操纵”用于理论翻译理论研究, 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观点来看,

现。操纵学派认为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观(poetics)⁷⁸⁾和赞助人(patronage)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在他们看来,“翻译就是对原语文本的改写”,“重写即操纵,并为权力服务”。而“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出意识形态、诗学观对文学的操纵,使其“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按某一特定的方式发挥其功能”。⁷⁹⁾换言之,意识形态、诗学观等诸多语言外因素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始终操纵着翻译的全过程。本文中所论述的译者的立场,即通过意识形态、诗学观等译者主观上的判断,从翻译的初始阶段,便有意地挑选韩国文学译著。在符合“启蒙”与“革命”的时代话语下,以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弱小民族文学、左翼文学为取向,重写翻译原作文本的结果,实际上造成了对原作文本的理解上的误读。

上述的问题实则是翻译过程中所存在的普遍性现象,除此之外,中译韩国文学又存在异于此的特殊状况,即借助了另一种语言的间接翻译过程。图里(Toury)指出“翻译主要被视为一种便利的技术,用于引入文化急需的实体。在这种情况下,对间接翻译的容忍似乎是不言自明的。”⁸⁰⁾这种对间接翻译的容忍,意味着这些文学作品的内涵首先经过了日本乃在西方现代性的过滤与吸收,获得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认可,已经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李北鸣的《初阵》,在韩语文本《室素肥料工厂》(질소비료공장)中“朝鲜”和“日本”存在着紧张对立关系,但在《初阵》日语文本中却很少出现“朝鲜”和“日本”字样,而变成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另外,《室素肥料工厂》文本中不时显露出共产主义思想和唤起民众斗争的呼喊,而《初阵》却只保留了无产阶级文学色彩,即强调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

文吉正在后悔刚才没有好好休息,相浩推着空车走到文吉身旁,停下来,用粗嗓门唱道:民众的旗,红色的旗,紧裹着战士的尸体。这是《赤旗歌》。(《室素肥料工厂》)⁸¹⁾

这时候,推着空的输送车来的相浩,大声地唱起来了听罢,万国的工人……(《初阵》)⁸²⁾

从引文中可以发现,在日本发表的《初阵》删掉了《室素肥料工厂》里殖民地“朝鲜”和宗

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这一观点被认为是翻译理论操纵学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的雏形。之后出生于比利时的美籍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理论家André Lefevere(1985)提出把翻译研究纳入多种“重写”(rewriting)和“折射”(refraction)研究的范畴内,后来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操纵观,标志着操纵学派的正式形成。

78) 诗学观(poetics)一般是指组成文学系统的文体、主题与文学手法的总和。关于翻译学中的诗学观, Lefevere认为翻译中的诗学理论有两部分:“其一是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原型人物以及象征标志。其二是文学对于社会的作用和意义。”文本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文本的操纵与改写受到译入语社会主流诗学的支配与影响。Lefevere的翻译诗学观突破了传统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局限,明确了翻译不仅是译者在语言层次上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重写。同一文学作品经由译者“改写”并介绍给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语读者,也取决于翻译诗学作用。

79) André Lefevere,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p. 15.

80)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 133.

81) 李北鸣,〈室素肥料工厂〉,《朝鲜现代短篇小说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朝鲜语专业同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p. 109.

82) 李北鸣,〈初阵〉,《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胡风编译,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p. 83.

主国“日本”的紧张对立关系，而转化成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这种现象可以证明意识形态对文学和翻译活动的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也说明了韩国文学从日语文本转译成汉语的局限性。

此外，1934年7月由文学社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第3卷第1号的“翻译小说栏目”中刊载了黄源译张赫宙所著的《姓权的那个家伙》(權といふ男)一文，译文前附有译者对原作者及其创作的介绍，称张赫宙是“用日本文写作的朝鲜新进作家”，其作品多为“殖民地的朝鲜农村间的知识分子生活”，并引用日本评论家濑沼茂树的话称赞其小说有着“迂回曲折的文体”漂散着“一股特殊的风土香味”，书中人物“散发着朝鲜的民族性”。可见，黄源在选择翻译张赫宙的作品时，对原作所持有的认知是源自日本学界的，暂且不去讨论韩国学界对张赫宙的评价，当时处于扩张期的日本，为树立自身的主体性，积极提倡“近代超克论”，在日本殖民下的朝鲜则需要与之相应的民族情怀，因此这种所谓的朝鲜民族性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下“内鲜一体”的虚伪象征。黄源所谓的漂散着“风土味”的“朝鲜的民族性”实际上是在日本话语权下的一种朝鲜认知，难以避免其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更与当时韩国内部的文化认知有所差异。

在30年代韩国文学的中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以及赞助人的影响，使得译作不能完整地再现原作中所要表达的情绪，因此形成了一种非语言能力不足而产生的误读，同时这也是译者对于本土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妥协。那么，关于这种误读的产生经过以及对译作带来的影响，本文将以胡风的《山灵》为例进行具体讨论。

2) 以胡风《山灵》为例

《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胡风编译，1936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属于“译文丛书”系列。书中共收录短篇小说7篇，其中4篇为韩国小说，即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郑遇尚的《声》，而另外的3篇台湾小说，即杨逵的《送报夫》、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则不在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之内。

如上文中所提到的，操纵学派认为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那么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胡风编译《山灵》时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呢，就此，本文首先将从胡风的个人立场入手进行分析。关于胡风编译这部小说集的初衷，其在序文中有过如下陈述：

这些作品底开始翻译，说起来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运会。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了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因而把送报伏译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读者底热烈的感动和友人们底欢喜。于是又译了一篇山灵，同时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编译成书的意思。⁸³⁾

不难看出，胡风在翻译《山灵》之初，受到翻译“弱小民族”小说趋势的影响，进而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30年代启蒙与革命的社会现实，使得文学做出应变，更多的承担起功利性的作用，而作为可以唤醒国民的“弱小民族”文学自然也被

83) 胡风，〈山灵序〉，《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纳入到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胡风所翻译的《山灵》正是在这一立场下，对于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痛苦呻吟的朝鲜与台湾的民众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并以此来告诫中国国民：

几年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澈底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底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⁸⁴⁾

胡风继承了鲁迅的思想，同属左翼阵营，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此，在这种诗学观的影响下，《山灵》选编时，杨逵、李北鸣等有着明显左翼文学立场的作家作品被收入到其中。然而，作为译者的胡风，当其文学立场与原著所传达的情绪发生碰撞时，难免会出现对原著的重写(rewriting)或误读。这种误读也会随着译者的目的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带动下，影响到读者。关于《山灵》，以读者的立场，作家萧红(1936)在《孤独的生活》一文写道：

读完了《山灵》上《声》的那篇，雨不知道已经停了多久了？那已经哑了的权龙八，他对他自己的不幸，并不正面去惋惜，他正为着铲除这种不幸才来干这样的事情的。

.....

我感到了蓝色灯光的不足，于是开了那只白灯泡，准备再把《山灵》读下去。我的四面虽然更静了，等到我把自己也忘掉了时，好象我的周围也动荡了起来。⁸⁵⁾

萧红这段文字虽然有些感性随意，不过仍然可以想象得到，当时身处日本的萧红读到《山灵》这篇文章时所产生的触动。那么，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中国本土上千千万万读者读到《山灵》自然也会有不亚于萧红的共鸣，而这也恰恰就是胡风在编译《山灵》之初所要达到的预期。

另一方面，从《山灵》的翻译路径来看，胡风所译《山灵》中的韩国小说，皆重译至日语文本。其中较为特殊是李北鸣的《初阵》，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初阵》的最初在韩国连载时题名为《室素肥料工厂》，后在日本发表时改名为《初阵》，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存在着差异，而胡风《山灵》中收录的《初阵》则译自日语文本。此外，郑遇尚的《声》以及张赫宙的《山灵》和《上坟去的男子》则不存在韩语文本。胡风在翻译《山灵》时，由日语入手，自然无法避免日本学界话语权的影响，也因此对于同一文本出现了与韩国话语权下的不同理解。其中出入较大的便是张赫宙的作品，译著中的《山灵》与《上坟去的男子》分别发表于1933年、1935年，皆在《姓权的那个家伙》发表之后，属于张赫宙的早期作品，对此当时日本学界的观点据日本学者白川豊(1991)整理如下：

对其在韩国居住时期的作品，即便被指出日语文章能力的不足，但内容层面上有着左翼文学倾向的初期作品仍然受到了欢迎。然而在《姓权的那个家伙》发表之后，作品风格发生了变化，同时对其作品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是表现初期作品有过的阶级的、民族的苦恼的左翼文学阵营的延续，一种则认为是描写朝鲜世态风俗的异国趣味性。两种评价实为日本读者以其自身立场做出的判断，只有逸见广、村山知义等能以客观的视角对张赫宙的作品做出有益的评价。⁸⁶⁾

84) 胡风，前揭。

85) 萧红，《孤独的生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p. 120。

86) 白川豊，〈張赫宙作品에 대한 韓日兩國에서의 同時대의 反應〉，《日本學》，第10號，1991，p. 13

可以看出,日本话语权下对这一时期张赫宙作品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一方面认为是左翼文学的延续,一方面则认为是朝鲜风俗的异国趣味,但总体上都还是褒义的评价。但反观同时期韩国的评价,则认为是较之初期左翼文学作品的一种退步,更多是批判的声音:

以描写韩国世态风俗出现文风转变的《姓权的那个家伙》发表以后,其日语作品较之初期作品受到了更多认为是退步的批判。只有俞镇午一如既往地包容张赫宙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性的批判。⁸⁷⁾

当时处于日本话语权下的胡风,不能更多地听到来自韩国学界的声音,只能借助日本的话语去理解张赫宙的作品,因此也就出现了与韩国对原著解读上的偏差。后来胡风在回忆录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性的回应:

这里,应该补说一点情况。我受到批判的时候,有一位朝鲜同志批评我不应该译张赫宙的小说,说我应该知道张赫宙是什么人。看他的口气,好像认为张赫宙并不是一个革命作家。实际上,我的确不知道张赫宙是不是革命作家。但不管他是怎么的作家,我只能看他的作品。作评是同情穷苦人民,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我认为那就对斗争有利,应该把那当作难得的教材。在那样的情况下面,能够得到这样的作品,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⁸⁸⁾

最后,从“赞助人”的立场来看,《山灵》属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的“译文丛书”系列。作为《山灵》“赞助人”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于1935年5月,原名文化生活社,9月后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任总编辑。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系列实则是鲁迅发起,初由黄源担任主编,后改由巴金主编。在30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有成文的编辑方针和编辑计划,然而,从“译文丛书”翻译实践活动来看,作为“赞助人”的出版公司与编辑者也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从第一部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到后来的系列,有着明显左翼文学的倾向,这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胡风受邀编译《山灵》一书,收录到“译文丛书”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0. 笔者译,原文如下:

韓國在住時의 作品에 대해서는 日本語文章力의 不足등을 지적받으면서도 내용면의 프로文學의 경향으로 初期作品은 환영을 받았다. 그러나 〈權といふ男〉 이후 작품을 전환하자, 초기작품에서 볼 수 있었던 階級的 또는 民族的 苦惱를 계속 쓰라는 프로文學진영의 意見과, 조선의 世態・風俗을 그리라는 異國趣味의인 관심에서 나온 意見으로 評價가 갈라지게 된다. 양측 다 일본인독자로서의 제멋대로의 의견인데, 逸見廣, 村山知義 등은 作品을 客觀的인 눈으로 보고 張赫宙에게는 有益한 助言이 될 만했다.

87) 白川豊(1991), 前掲, p. 129. 笔者译, 原文如下:

한국의 世態・風俗 등을 그리는 作風으로 전환한 〈權といふ男〉(33)以後의 日本語作品에 대해서는 初期作品보다 더 後退했다는 批判이 많았다. 단 俞鎮午만은 일관해서 張赫宙文學을 따뜻하게 받아들이면서 객관적인 批判을 했다.

88) 胡风, 《胡风回忆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p. 44.

6. 结语

回顾30年代的韩国文学中译活动，在“启蒙”与“革命”的时代氛围下，文学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绪一种形式，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功利性。文学渐渐演变成一种工具，唤醒起沉睡的大众，呼吁着社会的变革。在有着启蒙性质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以及有着革命性质的左翼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浪潮的涌动下，文学翻译活动亦无法逃脱被染上时代标签的命运。而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即使不情愿戴上“叛徒”(traître)的帽子，然而要摘下来也是困难重重了。

在韩国文学的中译活动中，无论译者在翻译之初是否出于某种目的性，但从其结果上来看，已经受到译者的立场和诗学观的影响，使得译文较之原作或多或少出现了重写甚至误读。译者在文学的本性和社会主流意识的两者之间做出抉择时，由于翻译赞助人的推波助澜，更加难以避免向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靠拢。即便如此，在30年代窘困的社会环境下，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当时的韩国文学，感受到韩国的人文气息，也是弥足珍贵的。同时也为当今的文学翻译活动研究带了思考，翻译活动是否真如André Lefevere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对原作的背信弃义，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其自身的文学立场、诗学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究竟要与译作保持怎样的一个距离，相信这会是诠释翻译活动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

【参考文献】

-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钟叔河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方丽娟,《被发现的儿童: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拓荒史》,台北:秀威资讯,2015。
-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汤忠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130页。
- 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胡 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 胡 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下卷),易鑫鼎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 鲁 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_____,《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北京:北大第一院新潮社,1923。
- 罗岗、陈春燕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第2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 茅 盾,《雪人》,上海:开明书店,1928。
- 萧 红,《孤独的生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 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André Lefevere,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Mona Baker,《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 Shuttleworth Mark、Moir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中译, 30年代, 韩国文学, 重译, 山灵		
Key Words	영문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30s, Korean Literature, Retranslation, <i>Shan Ling</i>		
<div>A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the 30s</div> <div>Sun, Ji / Roh, Jung-Eun</div> <p>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30s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wo major themes of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literature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which i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re are not only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but also a few Korean literature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s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Korean literature were ignored by the academia of China and Korea. Related research did not begin to emerg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Most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discuss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the 30s, all of them are based on China's standpoint, that is 'target orient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Korean literature texts into Chinese, the translation path was diversified, including the direct translation and retranslation. In this case, it is inevitable to discuss problem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hile simply discussing the issu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t is unavoidable to cause an error in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organiz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the 30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 positions of Chinese translators, to contras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to interpret the purpos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30s. Finally, taking Hu Feng's <i>Shan Ling</i> as an example, from the path of translati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at affect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the translators' view of Poetics, and the translation sponsor, etc., to discuss the proposition of misreading in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the 30s.</p>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손제 / 孙霁 / Sun, Ji		노정은 / 鲁贞银 / Roh, Jung-Eun
	소 속	建国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建国大学 中语中文学科
	Em@il	sunjikor@naver.com		rjecilvia@daum.net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8년 08월 15일		심 사 일 2018년 08월 29일
	수 정 일	2018년 09월 15일		게재확정일 2018년 09월 22일